



西寧城中文史資料

第十九輯

政协西宁市城中区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封面设计：文盛

封面题字：王云

封面图片：南山法幢寺新建“大雄宝殿” 曹杰 摄影

《西宁城中文史资料》编委会

主 任:戴福山

副 主 任:张启贵 杨文盛

委 员:戴福山 张启贵 刘卓克 付 冰
杨文盛 孙育杰 崔俊艳 赵 超

主 编:张启贵

副 主 编:杨文盛

特邀编审:李逢春

特邀编辑:张志珪 曹 杰

责任编辑:杨文盛

本辑内容提要:

- 杨质夫传
- 回忆父亲邵余三
- 抗战时期的青海大事记
- 西宁曲艺演唱大事记
- 今昔文峰碑

西宁城中文史资料

第十九辑目录

湟滨名流

- 杨质夫传 李逢春(1)
- 回忆父亲邵余三 邵慧仲(14)
- 一代名士韩树森
——青海省第二个老北大毕业生
..... 胡世兴(20)
- 周宜遵先生事略 林中俚(32)
- 湟滨丹青竞风流
——记先父郭世清
..... 郭宁生(35)

往事钩沉

- 人生如梦 往事如烟
——我在中学时代的回忆
..... 郭来柱(41)
- 西宁杂忆 张志珪(66)
- 民国时期的扩田增粮 加征田赋 罗耀南(76)
- 清末民初畜产品交易中的歌家 张志珪(81)

岁月巷道

- 抗日战争时期的青海大事记 魏明章(89)
我对市粮食局托儿所的回忆 罗 平(123)

古城街巷

- 水眼头 后涝坝 赵生琛(127)
后马场 昇平巷
——西宁街巷的变迁 赵生琛(129)

文化撷英

- 西宁曲艺演唱大事记 董绍萱(133)

古城胜迹

- 西宁城中明代古刹——弘觉寺 曹玉章(141)

文史常识

- 今昔文峰碑 杨文盛(147)

杨质夫传

李逢春



杨质夫

杨爻字质夫，以字行，藏语名贤泽珠桑（意为“慈舟”）。1906年农历七月初十出生于互助县红崖子沟老幼庄，后迁居西宁。

少时在家乡读小学的杨质夫聪慧卓越，读书辄过目不忘。1920年前后，考入宁海蒙番学校，藏文是该校的必修课，杨质夫从此接触到了藏文化，并为之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杨质夫在蒙番学校学习期间，适逢时任西宁道尹的黎丹（字雨民，号无我，湖南湘潭人）为“学习西藏文字，沟通汉藏文化”，创办西宁藏文研究社（1929年青海建省后，改组为青海藏文研究社），掀起了学习藏语文的热潮，这一大环境为杨质夫潜心学习藏文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从而打下了坚实的藏文基础。1924年蒙番学校改称宁海蒙番师范学校，杨质夫于该校毕业，十八岁的他因品学兼优，留校任教，后又兼任西宁县立第一高等小学教师，从此踏上了教书育人之路。1925年，朱绣（字锦屏，湟源人）出任蒙番师范学校校长，非常器重对汉、藏文都有造诣的青年教师杨质夫，便推荐杨为藏文研究社的基本社员，从此他在汉藏文化的研究领域不断地奋进和攀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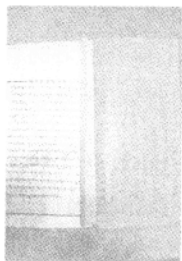
1926年，冯玉祥委派林兢（浙江人）任西宁道尹，林与甘边宁海镇守使马麒向甘肃省建议设立垦务局，负责土地清丈、调查、测绘、统计和荒地发包等项事宜。第二年4月，西宁道垦务局设立，朱绣出任总办，杨质夫随朱绣到垦务局任股员，这是杨一生中

唯一一次从事的一段与藏文无关的事。不久,朱绣辞去西宁道垦务局总办一职,由林兢兼任总办,杨质夫即仍回宁海蒙番师范学校任教。

藏文研究社成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编辑一部学习西藏文字、沟通汉藏文化的大型工具书《藏汉大辞典》。

藏汉文化的交流源远流长,在相互交流学习中总结、编辑出了诸如明代《华夷译语》一书中的《西番译语》,清代《四体清文鉴》、《五体清文鉴》等工具书,但这些书或内容过简,或检索不便,很难适应新形势下汉、藏文化交流的需要。有鉴于此,黎丹以藏文研究社成员为工作班子,主持编纂学习和研究藏语文的大型工具书《藏汉大辞典》,杨质夫参加了该书的资料收集、整理和编辑工作,并与此书稿相伴终生。

《藏汉大辞典》在大家的努力下,到1927年,编辑工作基本完成,经藏族学者古朗仓、晋美仓等人的审校、补充,基本形成了定稿,完成了藏、汉文化史上具有开创意义的这一宏大工程。为了出版这部凝聚着众多人心血的《大辞典》,就在这一年,已卸去西宁道尹之职的黎丹,偕同杨质夫携带《藏汉大辞典》稿赴南京,打算通过南京支那内学院院长欧阳竟无谋求出版此书。然而当时国内不具备印刷藏文的条件,加之经费拮据,黎、杨二人虽多方奔波,但出版无望,杨质夫客居南京,又生计无着,无奈之下,黎丹只得介绍杨到



1932年出版的《藏汉小辞典》

南京支那内学院一面工作一面进修汉藏文佛经。在此期间,杨质夫在欧阳竟无的指导下,参考《英藏辞典》的体例,从《藏汉大辞典》中摘录日常应用的条目,依外文编辑词典的格式,按藏文字母的排列顺序,编成了中国第一部印刷出版的藏汉合璧的工具书《藏汉小辞典》。这部《小辞典》后经德扎寺智化达等学者的审定,

于1932年由青海省政府印刷局石印出版。由于《藏汉小辞典》的内容简明、实用，又便于检索，因而很受学习藏语文人们的喜爱，解放前后曾多次在北京翻印出版发行。

身居南京的杨质夫，于1929年至1930年间，在蒙藏委员会任藏文编译兼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称中央政治学校）西康班藏文教员。从此，他开始了从事藏文翻译和藏文化的教学工作。

1929年青海建省，同年8月，首任青海省政府主席孙连仲调任代理甘肃省政府主席，青海省政府主席由马麒代理，9月，主持藏文研究社的黎丹出任青海省政府委员，兼任省政府秘书长。由于政务繁忙，藏文研究社亟需得力人员协助工作，于是黎丹致书在南京的杨质夫，商请其返回西宁协助黎丹做藏文研究社的工作。杨质夫返回西宁后，在协助黎丹做藏文研究社工作的同时，被任命为青海省政府秘书处藏文秘书，不久，又兼任青海蒙藏师范学校校长。1931年春召开青海藏文研究社第一次社员大会，明确研究社内部机构设置和人员分工，由黎丹兼任校长，下设研究、教务、评议三个部，研究部由陈显荣任主任，杨质夫任教务主任。11月，藏文研究社在西宁隍庙街崇庆寺（今解放路西宁市少年宫址）举办培训班，由杨质夫、海言善（甘肃藏族）、陈文（又名陈智博，湖北人）等为教师，义务教学。学习班历时三年，培养了一批民族教育和藏文翻译人才。杨质夫为此付出了很多精力和心血。

为更全面地充实《藏汉大辞典》的内容，在举办培训班的同时，由杨质夫负责，组织藏文研究社员欧阳鸞、吴均、侯生珍、沈桐清、温永存等十余位社员，将《瑜伽师地论·法数表》的全部词汇及其释义进过排比抄录，分别纳入《藏汉大辞典》的有关条目中，于1933年底完成了这一工作，使《大辞典》的内容更加充实、丰富、完善。

也就是这一年，杨质夫与其兄杨焕（字子文）为报答家乡小学培育之恩，以其母亲的名义，为家乡修建互助县第六高级小学捐赠银元1000元，众人为此树碑铭记其事，可惜此碑在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被毁,然而民间口碑至今犹在传颂。

1931年初,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图谋侵占我东北地区之际,西藏地方亲英派势力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大肆进行分裂中国的活动。1931年2月,亲英派武装进犯青海玉树地区,1932年3月,藏方又以保护尕旦寺为名,以克色代本为前敌总指挥,率兵4000进军玉树,被青海方面击败。这年10月,青海与西康部队迫进昌都,在这种形势下西藏方面以达赖十三世的名义电请国民政府指令青海军队退兵,1933年4月青海方面和西藏亲英集团达到“青藏和约”,青藏战事告一段落。在这一背景下,南京国民政府以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青海藏文研究社社长的黎丹以个人名义组织西藏巡礼团赴拉萨。巡礼团一方面是为深入学习藏传佛教理论,促进汉藏文化交流,密切汉藏学术界交往,充实《藏汉大辞典》的内容,另外一方面,当与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以及西藏僧俗上层做疏导,调解青康藏关系,遏制分裂势力的漫延有关。做为巡礼团总干事的杨质夫,自始至终参加了巡礼团各个方面的工作。

巡礼团成员于1933年6月24日从西宁出发,齐集湟源东科寺,27日,省民政厅厅长谭时钦、教育厅厅长杨子高、省政府秘书长冯仲翔等政要十余人亲到东科寺欢送巡礼团一行。29日巡礼团偕同二十余家商队由东科寺启程,沿自元明清以来由西宁通往拉萨的青藏商道西行,历时80多天,到同年9月20日抵达西藏拉萨。

在巡礼团活动期间杨质夫将所经所见所闻逐日记入了《入藏日记》。这部日记历经坎坷,大多散佚,今仅存由其子杨照塘、杨安塘保存下来的自1933年6月23日至1934年2月3日的残卷两册,其内容涉及青藏历史、地理、道路里程、民族分布、山川河流、物产、气象、资源开发以及藏汉关系等诸多方面,为研究青藏史地和藏汉关系记录了丰富、翔实的资料。

如7月2日《日记》记述倒淌河、青海湖的自然风貌、动植物等生态情况：

“……倒淌河流域有地宽二十余里，窄处不下十里，大致平坦。动物多为鼠类，植物最多者为芨芨草，一望无涯，几于农田。自青海（湖）东头起，南山笔直西行，北山则循海岸西北行，为半环形。南山有灌木林，内多浪麻之属，迤西绵亘约七十里云。行至青海南岸时天际多云，海水映作白色，甚为美观。遥见北岸高山陡峻，据谓是金石山，祁连山之脉也。山前沙冈垒垒，土人称为喜玛拉冬，即七沙山之意也。冈后为察汗诺门罕牧地之达不禹，迤西长岭绵亘，乃刚咱族（笔者注：刚咱今译作刚察）驻牧地也。西望则海水连天，不见边际。复前进，草滩甚平，无芨芨，为天然之良好飞机场……。”青海湖及其周边的环境及生态状况历历在目。

再如7月7日《日记》记述在茶卡盐池所见，是研究茶卡盐湖开发史的可靠史料：

“出门策马向南行四里至海北岸，有大奔康插以柏枝等物（大奔康可译作大佛龕）。盐池东西约有四十余里，南北约二十余里，周约百二十余里，面积约为八十余方里。池面为盐盖所蔽，骤看白色如冰桥上覆盖以薄雪，其取盐之地在池中央，可由盐盖通过。盐盖厚二寸，上敷盐末厚约一分，下粘沙盐（状如细沙故名）厚二三寸，坚硬如石。余等行二里许至取盐处，盐工十余人正在挖取，其采取方法：先以铁凿凿开盐盖，盖下为水，水甚卤，水下为结晶体灰色透明，最大者一寸见方，普通者大如骰子，其最佳者为黑盐，淘洗服与常盐无异，其味之美无与伦比。至其地，池水盐盖岸土之属无一非盐，第（只）其味差于常盐耳。据采盐者言，是池到处皆可采取，其深浅未可测。渠等（他们）曾用一丈长之勺柄挖掘，从未探得底云。盐之产量极多，每人每日可采七八百斤，实足惊人。将来交通便利，需要增大，则此不啻为青海财政之命脉，吾人甚望理想早能成为现实。”

《日记》记载了1935年1月19日在拉萨遇到的一次月蚀,不仅是研究青藏高原天象的资料,也是研究当地民俗的可靠记录:

“晚间月出时已稍蚀,其后渐蚀渐多,至八时许全蚀,夜黑如晦,市人狂叫急呼,有放枪者,有燃纸炮者,有敲锣鼓,有吹螺贝喇叭者,有于屋顶献灯者,举市若狂,情形极紧张,其迷信之情形与行动与内地似而过之。喇嘛念经祈祷尤为普遍。至十时许渐渐挣脱,比至漫(满)圆已十二时许。月之全蚀为余有生以来所未见,今竟于西藏见之,亦幸事也。”

《日记》记载巡礼团一行与西藏有关方面在拉萨庆祝“双十节”的内容为研究西藏现代历史和汉藏关系提供了翔实可靠,很有意义的史料。通过此,更能了解巡礼团入藏的目的和意义。

(1934年) 10月10日 星期三 晴

“是日为国庆日,(国民政府驻藏)专使行署于上午十时在行署开会庆祝,下午在柳林聚餐。本团全体于九时半同赴行署参加庆祝。准时开会如仪后,首由黄专使报告,略谓:今日为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之国庆,同人等在极西之拉萨开会庆祝,实属难得。吾人在庆祝之中应体念先总理及诸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应学艰苦卓绝之大无畏精神,应尽后死者之责任,尤其是在此地应格外努力云云。次由黎(丹)讲演,略谓:民国成立已二十三年,吾人今日在此间第一次庆祝会,已嫌太迟,然吾人在二十三年中无日不希望国旗飘于蒙藏,国庆普遍于蒙藏各地,今日竟能在此实地参加庆祝,可谓有志竟成矣。自今日始,可谓中央与西藏联合之始,吾人应从此努力,渐次唤醒蒙藏民众,促进西藏自治,以图达先总理民族主义,国内民族一律平等之目的。然唤起与扶持之工作颇不易进行,甚或引起反复。故须:1.委曲求全;2.诚恳相待;3.谨慎从事云云。毕即散会。下午同人往恰作林迦与黄专使共宴坐谈。时许,主客齐集摄影,以志纪念,并摄活动影片。”

《日记》内容丰富翔实,很有史料价值。

《日记》中还保存了黎丹赴藏途中的诗作 17 首。黎氏一生著述颇丰,然大多在青海省图书馆火灾中被毁,《日记》保存的这部分诗作弥足珍贵。

赴西藏巡礼期间,杨质夫还著有《西藏巡礼团途中纪事》(载《西北开发月刊》第二卷第二期),主要记述了青藏高原风情,抒发作者的情怀。

到西藏后,杨质夫穿上僧衣,拜西饶嘉措大师为师,在哲蚌寺郭莽学院学习西藏文史、哲学等。在拉萨期间,以巡礼朝圣者的身份广泛结交西藏上层僧俗人士,在谈论佛学理论的同时也论及国内形势等。如《入藏日记》1934 年 2 月 3 日记载:“……十时许,余(杨质夫)以《国耻中华》地图一张送往龙本格喜处,适铁武格喜群宰在座,格喜未归。坐候片时,格喜回,余以地图呈阅,渠(他)与群宰垂询图中疆域、各省位置及东北四省丧失情形极详。”

在拉萨期间,黎丹、杨质夫还请喜饶嘉措等著名学者全面审定《藏汉大辞典》。杨质夫还撰写了《历代噶丹赤巴考》、《西藏世家源流考》等论著。

其时,南京国民政府礼聘喜饶嘉措为国立中央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等“五大学”举办学术讲座,于是,黎丹、杨质夫于 1936 年夏陪同喜饶嘉措离开拉萨,经印度回国,1937 年春抵达南京。喜饶嘉措在“五大学”讲学期间,杨质夫始终作为翻译,以他广博精湛的藏汉文知识赢得喜饶嘉措的信任,也赢得了听众的称道,当时就有“杨质夫是喜饶嘉措的舌头”的赞誉。

这一年 5 月,杨质夫在南京由张励生、吴开先介绍,加入了国民党。

夏,杨质夫携存放在南京大恢复巷甘青会馆的《藏汉大辞典》稿,随喜饶嘉措回青海。不久,在一次日机轰炸南京时,甘青会馆被夷为平地,幸好《大辞典》被先期带回青海,才免遭此劫。

回到西宁后的杨质夫因其社会影响，被青海省政府任命为共和县县长，然而一心研究藏文化，无意周旋于官场的他，两次进见省政府主席马步芳，以“我不会当县长”为由坚辞未就。那时，正值抗日战争进入紧张阶段，南京政府为了维系边疆少数民族和大西北后方的稳定，以教育部和蒙藏委员会的名义，于1939年5月派遣喜饶嘉措赴青海、甘肃、西康（旧省名。其地包括今四川省西部、西藏自治区东部）等地各大寺院举行祈祷法会，宣传抗日救国，杨质夫作为喜饶嘉措的得力助手和翻译，参预了整个活动。8月，南京政府西迁重庆，9月，召开第四届国民参政会，作为参政员的喜饶嘉措赴渝参加会议，杨质夫随从到重庆，被任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边疆党务处总干事，编译委员兼藏文翻译。在此期间经人介绍，他与冯云仙相识并结为伉俪。



冯云仙

冯云仙（1909—1978年）西康巴塘（今属四川省）人。藏族，毕业于四川雅安师范学校。历任国民党抗日战地服务团团、战地儿童西康教养院院长、玉树小学校长、国民政府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和国民政府监察院监察委员等职，主要从事战时儿童救济和学校教育工作。

在重庆期间，杨质夫结交了著名学者顾颉刚、隆聚贤、吴文藻、李安宅、任乃强、黄文弼、黄奋生等人，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研究青藏历史、地理和文化，研究佛学理论，并参加了由顾颉刚负责的学术团体边疆学会。

正当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西藏地方当局在英帝国主义的操纵下，于1942年7月公然成立所谓“外交局”，意欲脱离中央政府搞所谓西藏“独立”，即将修建的青藏公路也被西藏地方当局阻断，

特别是西藏内部大规模地排斥爱国僧侣,大搞分裂活动。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中央准备成立西藏省党部,加强对西藏的统治。内定西藏省党部筹备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喜饶嘉措担任,杨质夫为书记长,冯云仙等为委员。

1943年夏,喜饶嘉措、杨质夫、冯云仙等一行十余人赴西藏,年底到达藏北黑河(今西藏那曲),被藏军阻拦,经多方交涉,藏方只同意喜饶嘉措一人入藏,其余人员一律不得随行。据说在交涉中杨质夫还被毆伤。在交涉无果的情况下,喜饶嘉措、杨质夫、冯云仙等一行于1944年夏经玉树、四川返回重庆。此行虽未达到去拉萨的目的,但杨质夫对藏北三十九族进行了社会调查,完成了《夥尔三十九族之调查与研究》等论著。

西宁地区于1934年在今五四大街小学设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西宁分校,1938年改名为国立西宁师范学校(简称“国师”),1945年夏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杨质夫为该校校长,从此,他由主要从事藏文翻译和研究转入民族教育工作。在他任校长期间,重视少数民族学生和女学生的招收。以1947年为例,是年全校有藏、蒙、回、土等民族学生70人,占全校学生392人的20%多;学生中有女学生10人,这在当时西宁的中等学校中也是可观的。杨质夫在“国师”开设边事课,主要进行青藏历史、地理等乡土教材的教学。“国师”的毕业生绝大多数在甘青地区任小学教师,为这一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贡献。

当时为了培养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人才,兰州大学于1947年建立边疆语文学系(简称“边语系”)聘请杨质夫为“边语系”系主任兼教授,杨与聘任为边语系副教授的吴均同赴兰州。在杨离开西宁期间,“国师”的工作由代校长杨生霖(字雨民,青海大通景阳乡人)代理,杨质夫则奔波于兰州、西宁两地工作。为了充实兰大边语系的藏文图书资料,杨质夫凭借自己在藏学界广泛的交际和良好的威信,往来奔走在甘肃拉卜楞寺、青海塔尔寺、隆务寺等寺院之间,收

集了许多教学所需的资料,充实了兰大图书馆的馆藏,至今仍为学界称道。

在这段时间,杨质夫撰写了《塔尔寺的灵魂——宗喀巴》、《塔尔寺概况》等著作。1949年暑假期间,杨质夫、吴均从兰州大学带领边语系学生回西宁调研。

9月5日西宁解放,9月26日青海省人民军政委员会成立,代行青海省人民政府职权,军政委员会文教处命杨质夫继续负责原国立西宁师范的工作。1950年1月1日青海省人民政府成立,随后,省政府教育厅将原国立西宁师范与西宁师范学校合并为青海省西宁师范学校(简称“青师”),正式任命杨质夫为该校校长。

1950年2月28日,杨质夫被逮捕,1951年6月30日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据有关档案资料,“原判主要罪恶事实”有三条,即①“解放前一贯替国民党及其反动政府从事对藏区的反动宣传,欺骗麻痹藏民,阻碍革命进展。②解放前替敌党处理及供给藏区情报,以利统治者对藏区人民统治压榨,并积极培养统治毒化藏区的特务爪牙。③解放后鼓动国师学生反对军代表,掀起罢课风潮,进行反革命活动。”以上前两条皆属历史问题,关于其中第三条的起因及经过,据当时任青海省西宁师范教师,现已九十高龄的青海师大历史系副研究员陈希夷回忆:当时学校派来了军代表,为了了解和掌握学校师生中的动态,以便开展工作,军代表在师生中发现和培养了几位积极分子。积极分子积极配合军代表工作,却引起了部分学生的不满,其中个别人以积极分子学生与军代表不应同居一室为借口,公然贴出大字报指责军代表。对此,军代表提出要严肃处理,而身为校长的杨质夫却以学生提意见,“此乃平常事”为由,不作处理。杨的这种态度引起了军代表的严重关注,并对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事后不久,杨质夫就被逮捕了。

杨质夫被判刑后投入劳改新生印刷厂(1957年改名为西宁新生印刷厂)劳动改造,主要做该厂的藏文翻译工作。因工作需要,那部《藏汉大辞典》稿也被带进狱中,与杨朝夕与共。

劳动改造期间的杨质夫,按照政府的安排,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青海解放后,尖扎昂拉千户项谦在青马残余军官马成贤、谭呈祥、尕石鲁、韩肥肥等人的策动下掀起武装暴乱,以昂拉为据点,四处抢劫,骚扰当地政府和驻军。中共青海省委、省人民政府及驻军部队从1950年9月至1952年4月间,先后17次派人赴昂拉,规劝项谦交出隐匿在那里的反革命分子,放下武器,归向人民。在此期间杨质夫先后两次被调出监外,随时任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喜饶嘉措去昂拉,作规劝项谦的翻译工作。

1951年初,十四世达赖在西藏亲政,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政府代表团赴京进行和平谈判,这年5月《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签定,身为囚犯杨质夫被送往北京,参加“协议”和其它重要文件的翻译工作。

“新生体”藏文铅字字模的创制,是杨质夫对藏文印刷事业的一大贡献。

随着汉藏文交流越来越繁盛,对藏文印刷术需加以改进的要求也愈加迫切,然而自19世纪晚期有藏文印刷字模以来,一直未能找到即不影响藏文原字形的美观,又工艺简易,方便操作的方法。为了适应藏文印刷事业发展的需要,1952年,新生印刷厂将改进藏文印刷字模的任务交给了杨质夫和与杨同在该厂的排版技工渭建中、刻铸技工李常盛、刻字技工瞿守一等人。他们经过反复研究,精心设计,仿照汉字铅字雕刻方法,创造性地用“藏文加点法”解决了藏文排版中的难题,终于设计出了一套当时定名为“新生体”的藏文楷体字模。在此基础上,又刻铸了初号、1—7号各字号的字模,随后又刻制成黑体、行书、长体等多种字体的字模,形成了

藏文铅字字模系统,使印刷操作规范、便捷、印刷品更加新颖、美观。之后,“新生体”藏文字模在全国普遍推广使用,大大促进了藏文印刷事业的发展。

对于杨质夫在藏文铅字印刷的改进,对别人在藏文方面的帮助提高以及校对方面的突出表现,新生印刷厂在上报青海省高级人民法院的《杨质夫材料》中作了如下记述:

杨质夫“自投入劳改,……生产中确有显著成绩,因此1950年——1953年,曾两次得到政府的宽大处理(原系死缓,于1952年改判无期徒刑,后又改判为有期徒刑,后又改为二十年徒刑)。

减刑后在生产中仍积极想办法提高藏文排字效率,1953年研究提出,1955年正式开始采用的‘藏文加点’对提高藏文排字效率有很大作用,经过一年试验,藏文加点一般可提高排字效率30%—50%,一年可给国家创造总产值达12000元,同时可大大降低成本,同时铸字时,如系加点藏文可提高效率一倍,这一改造对提高产值、质量,减少事故也起了很大作用。

该犯藏文程度高,能耐心包教其他罪犯,学习藏文为(和)校对技术,在这一年的时间内藏文校对的程度都有显著提高,如(朱承业、祁万秀都是他包教的。)

他对产品质量十分注意,他对编译的稿件没发生过错误,校对中对别人校的错误之处能及时地提出加以纠正。同时对原稿中的错误发现后也能提出供顾主参考,减少了很多问题。如:在翻译汪锋副主任的讲话材料时,‘我们与反动派相比时’一句如果翻成藏文也可‘我们与反动派竞赛时’意思去理解它,提出后顾主认为如不改写确实是个问题。又如牧区政训十一期中有一句‘国营贸易机构,应让出若干地点给私商’,而译委会译成相反的句子;‘小学以下程度的有××人而其中有文盲××人’,译委会译成‘小学程度的××人而其中有文盲××人’;小学课本‘选了十几个共产党员作先锋队’,译委会译成‘选了十几个先锋队挑成共产党员’等一些重大